

经典再生与文化遗产：吴笛的跨媒介传播研究

Classical Regener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Wu Di's Inter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龙迪勇 (Long Diyong) 韩文文 (Han Wenwen)

内容摘要：吴笛教授基于翻译实践和外国文学研究，以跨媒介研究的视野审视经典文本的跨媒介传播，认为文字文本向影像文本的跨媒介转换，类似翻译学话语体系中的源语文本到译入语文本的转换。翻译从一种文字形式向另一种文字形式的转换，是对经典的一种“再创作”；跨媒介传播则利用图像、音像等媒介，使文字文本向视觉等其他文本转换，或者说从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朝另一种表现形式转换，这相当于跨媒介意义上的“翻译”。源语文本在不断的翻译过程中获得再生，得以代代流传。跨媒介传播所引发的从文字文本到视觉等其他文本的变异，更是体现了源语文本生命的一种“再生”。从英美文学翻译实践到文学跨媒介传播研究，吴笛教授始终以跨界的多维视野，切实践行文学经典再生与文化遗产的使命。他时刻关注文学经典的传播与再生，他的翻译事业和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国内率先开展的文学跨媒介传播研究，更是开风气之先，必将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

关键词：吴笛；跨界思维；跨媒介传播；经典再生；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龙迪勇，东南大学首席教授、二级教授，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故事与艺术媒介实验室负责人，主要从事叙事学、比较艺术学研究；韩文文，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理论研究。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英国文学在拉斐尔前派艺术中的跨媒介再现研究”【项目批号：22WWB0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Title: Classical Regener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Wu Di's Inter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bstract: Professor Wu Di,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ture, examines the cross-media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media research, and believes that the cross-media conversion from written text to video text is similar to that from source language text to target language text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re-creation” of the classics in the sense of conversion from one textual form to another; cross-media dissemination makes use of images, audio and video

media to convert written texts to other texts such as visual texts, or to convert from one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o another,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ranslation in the cross-media sense.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 is regenerated in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llowing it to be transmit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variation from written texts to other texts, such as visual texts, triggered by cross-media communication is a reflection of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lif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 From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o the study of cross-media communication of literature, Professor Wu Di has always been practicing the mission of regener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a cross-border multi-dimensional vision. He always pays atten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and his translation career and academic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cross-media liter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at he has pioneered in China, are the first of its kind, and will surely have far-reaching academic impact.

Keywords: Wu Di; cross-border thinking; intermedia communication; classical regener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uthors: Long Diyong is Chief Professor and Senior Professor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Dean of the School of Arts, and Director of China Story and Art Media Laboratory.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narratology and comparative arts (Email: ldy7073@126.com). Han Wenwen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She mainly engages in research on art theory (Email: hww00710@163.com).

跨媒介研究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无论是作为观念，还是作为方法，“跨媒介”都被广泛运用于文学、艺术等学术研究领域中。在中国知网以“跨媒介”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截至2024年10月20日，可以检索到2500余篇相关论文，仅2024年就已有383篇。与之相关的学术会议、论文论著、课题立项等更是层出不穷。无疑，“跨媒介”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最受瞩目的研究焦点之一。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运用跨媒介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文艺门类中的跨媒介现象和跨媒介作品展开深入探讨和系统分析。其中，跨媒介叙事和跨媒介传播作为新的研究范式，尤其成为当前文学艺术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作为国内最早涉足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学者，本人早在2008年就组织召集了国内首届“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了“目前的叙事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种跨媒介趋势”（“叙事学研究的跨媒介趋势” 66）的观点。关于我的跨媒介叙事研究，感兴趣者可参考《跨媒介

叙事研究》一书¹，此不赘述。本文主要考察吴笛教授的跨媒介传播研究。

一、文学翻译与“跨界”思维

吴笛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出版了《俄罗斯小说发展史》《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哈代研究》等多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除了学术研究，吴笛还从事文学翻译，主要翻译英俄文学名著，不仅翻译作品众多，且翻译风格独具特色，在译界享有很高声誉。吴笛的文学翻译与文学研究可谓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文学翻译锤炼了吴笛的“跨界”思维并促成了他的跨媒介传播研究，或者说，吴笛的跨媒介传播研究基于其多年成功的文学翻译实践。

作为译者，吴笛坚信翻译家的使命是极其重要、崇高的，译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媒婆”，而是生命的创造者，翻译的过程就是不断创造生命的过程。吴笛在长期的翻译过程中培养了敏锐的“跨界”思维，这无形中促成了他对文学经典跨媒介传播的关注。他以翻译学的视角，来审视跨媒介传播，认为跨媒介传播如同文学翻译，使文学经典在新的传播途径和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他基于翻译实践展开外国文学的研究，并以跨媒体视野多次在会议及文章中讨论文学经典的影视“翻译”、外国文学经典的跨媒体传播等问题。基于他这种特殊的跨媒介研究路径，本文拟以其翻译实践及其文学研究中的“跨界”思维为基础，更多地从他关注的外国文学经典的跨媒介传播展开论述。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踏上文学翻译之路时，吴笛就在翻译实践中注意到文学艺术的“跨界”特质。在1988年翻译出版的诗选《含泪的圆舞曲》中，他就已经注意到作为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风景抒情诗中的“画面感”和“音乐性”，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其实是“美术”与“音乐”的复合体。在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诗中，既描绘了雨过天晴、“太阳把光彩朝大地抛洒 / 绿色的叶儿晶莹滴翠”的视觉画面感；又营造了“钻出了林地”、发出丁冬颤音的小溪的节奏感和音韵感。²在其后关于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抒情诗的两本译著中，他发现了雪莱自然抒情诗中迷人的音乐旋律。雪莱的诗歌，根据不同的情绪和主题需要，具有多变的节奏模式，韵脚变幻无穷，并配置头韵、内韵、叠句、元音相谐等多种艺术手段，从而产生出一种萦回往复的音调。尤其是一些较短的自然诗或爱情抒情诗，显得优美秀雅、富有迷人的音乐旋律。无论是《云》（“Cloud”，1820）中令人惊叹的出色的内韵，还是《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1819）中的头韵和连锁韵律，都是为了表现行云之态或秋风之声，在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追

1 参见龙迪勇：《跨媒介叙事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4年。《跨媒介叙事研究》一书出版之后，本人又发表了2篇相关论文，分别为“家族相似性、符号圈与艺术跨媒介叙事”（《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6期）与“画意摄影的跨媒介叙事论析”（《美术》2024年第10期）。

2 参见吴笛：“译者前言”，《含泪的圆舞曲》，帕斯捷尔纳克著，力冈、吴笛译，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0、200-201、278-279页。

求高妙的诗歌境界。这种特殊的音乐功能，在《致云雀》（“To a Skylark”，1820）一诗中运用得尤为成功，诗中急促而又悠扬的节奏，给人造成一种动荡回旋的音乐美感。¹

正是基于对诗歌特质和写作风格的敏锐感受，吴笛在翻译帕斯捷尔纳克、雪莱等诗人诗歌的实践中，努力用文学语言体现并传达源语文本的画面美感和声音内涵。²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耕作》一诗中，吴笛以“新生的械树一尘不染，白桦穿着淡绿的旗袍，耕地披上浅灰的衣服（……）”（《含泪的圆舞曲》246），描绘出了一幅逼真、如画般的景象。雪莱《西风颂》中每一节十四行诗，都采用了但丁《神曲》式的aba、bcb、cdc、ded、ee的“连锁韵律”与英国十四行诗相结合的方式，吴笛在译文中也保留了这种韵式，来传达前后呼应、层层推进的豪放气势和雄浑意境。在翻译雪莱《致云雀》一诗，更是注重以时急时缓的语言节奏，模拟了云雀的歌声，塑造了云雀腾地而起以及鸣声自天而降的音乐性形象。³

凭借着卓越的翻译技巧和诗性感觉，吴笛相继翻译出版了多部诗歌及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译作。进入21世纪之后，他的工作重心从外国文学翻译转向了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30余部外国文学经典著作的翻译积累，使得他对大量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献资料驾驭自如，也使得他在文学研究中游刃有余、新意迭出。⁴正如吴笛所说，他的不少英国文学研究著作，其实都是基于文学翻译实践而展开的，比如《哈代研究》（1994）和《哈代新论》（2009），就是基于《哈代抒情诗选》和《苔丝》等哈代诗歌和小说翻译实践基础上完成的两部学术专著。⁵确实，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跨媒介的“跨界”行为，而自觉的“跨界”思维，使吴笛在外国文学研究中不断拓展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就文学体裁而言，他兼顾小说和诗歌研究；就语种而言，他全面发挥精通多种语言的优势，同时聚焦诗歌艺术成就较高的国家或民族，对英语文学和俄语文学展开重点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他具有敏锐而自觉的“跨界”比较意识，涉及面广，研究视野开阔。⁶

总之，吴笛在长期的翻译实践过程中，深刻意识到外国文学经典研究要

1 参见吴笛：“序”，《雪莱抒情小诗》，雪莱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8页；雪莱：《雪莱抒情小诗》，吴笛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9-16页。

2 参见赵燕：“英美诗歌研究的多维视野——吴笛教授访谈录”，《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2023）：10。

3 参见吴笛：“序”，《雪莱抒情小诗》，雪莱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8页；雪莱：《雪莱抒情小诗》，吴笛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61-165、236-241页。

4 参见魏仁：“学术人生的盎然诗意——吴笛的外国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文化正义论丛》第3辑，何勤华、傅守祥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2页。

5 参见王娅婷、吴笛：“基于翻译实践的外国文学研究——吴笛教授访谈录”，《山东外语教学》1（2024）：2-3。

6 参见赵燕：“英美诗歌研究的多维视野——吴笛教授访谈录”，《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2023）：7-8。

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突破,迫切需要研究者具有多维视野和“跨界”思维,这不仅包括文学“内部研究”的审美视野,也包括认知批评等“外部研究”的跨界视野,只有通过这样的多维拓展,才能不断挖掘出文学经典的价值,从而体现文学研究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在其研究中,吴笛从“生态伦理批评”“文学法律批评”以及“文学跨媒介批评”等新的视角阐释了英美诗歌研究的多维视野。¹ 比如在《哈代新论》一书中,他汲取生态批评、心理学批评等批评技巧,并结合比较文学中的跨文化研究、影响研究等批评方法,对哈代的思想和创作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究;尤其是从跨媒介视角,考察了哈代作品在影视改编过程中所出现的“误读”“误译”等重要问题。² 这些新视角下的“跨界”研究均颇具特色、观点新颖、令人信服,为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打开了新思路、提供了新路径。

二、跨媒介传播与文学经典再生

早在21世纪初,吴笛就曾在一场题为“跨媒体视野中的世界文学——从影片《苔丝》谈起”的讲座中指出:现代学者除了对传统媒介的关注,也应对纸媒以外的传播产品进行“介入”。他以哈代的小说《苔丝》为例,认为这部经典作品仅仅依靠传统的纸质媒介进行传播,难以达到理想的地步,更广泛的传播靠的更应该是跨越传统纸质媒体之外的其他媒介,如经过影视机构改编的视频媒介、电台的声音媒介、还有网络上的电子文本等。不仅如此,世界文学的跨媒介欣赏,也不仅是通过一种媒介形式来接受某部作品,还要顾及文字、声音、影像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从跨媒介视角,结合文字、音响、画面、图像等多种媒介,发挥综合的作用,欣赏效果要远远好于单纯的、传统的文字等单一媒体。³

吴笛认为,传播的快慢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发展与文明的进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世界文学传播产品已经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他提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纸质文本的单一媒介流传转向音乐美术、影视动漫、网络电子的复合型的跨媒体流传(……)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局限于纸质文本的范畴也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从跨媒介的视野来介入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介入新的外国文学经典传播载体的研究,既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外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与拓展”A07版)。而且,通过跨媒介传播,文学经典也获得了“再生”。

1 关于此类研究方法,可参见吴笛:《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吴笛:“文学法律批评VS法律与文学”,《社会科学文摘》12(2021):118-120;吴笛:“论休斯诗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外国文学》3(2023):14-23;吴笛:“论布尔加科夫‘魔幻三部曲’中的科技伦理与科学选择”,《外国文学研究》5(2019):52-60。

2 参见吴笛:《哈代新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3 参见吴笛:“跨媒体视野中的世界文学”,《浙江人文大讲堂》第2辑,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钱江晚报编,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101-106页。

（一）跨媒介传播的特征

任何事物的传播都需要媒介。“媒介”一词，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意义属性，但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媒介”都是社会信息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文学经典得以流传的根本渠道。人类的文学经典从生成到传播，经历了多个传播阶段和多种传播方式，如口头传播、表演传播、文字传播、影像传播、网络传播等。从最开始的口耳相传到平面媒体，到之后的影视媒介、网络传播，文学经典经历了多种媒介的变换和发展。正如吴笛所言，当代的网络传播与之前的纸质文本相比，只是一种传播形式的改变，并不改变其文学内涵。网络传播利用图像扫描和文字识别等技术，将纸质文本经典以电子文本的形式进行传播，而电子文本一经打印就是纸质文本，所以没有本质性区别。而影像传播，包括美术传播、影视传播等，就不一样了，它们可以利用绘画、雕塑、动画等媒介对经典文本进行跨艺术或跨媒介传播。这种传播文本在内容上已经有别于原先的文本，因此是一种典型的跨媒介传播。

吴笛从翻译学的视角，来审视跨媒介传播的特征。从文字文本向影像文本的跨媒介转换，类似于翻译学话语体系中的源语文本到译入语文本的转换过程。翻译是从一种文字形式向另一种文字形式的转换；跨媒介传播则利用图像、音像、视频等媒介，使文字文本向视觉文本转换，或者说，从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朝另一种表现形式转换，这其实就相当于媒介意义的“翻译”。如果说，翻译使文学经典获得新的生命，使文学经典再经典化；那么，由跨媒介传播所引发的从文字文本向视觉文本的转换或变异，更是体现了“源语”文本生命的一种超越媒介的“再生”。¹

（二）跨媒介传播的途径

无论一部文学作品本身多么精彩，如果没有有效的传播途径，就很难成为经典。文学经典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永恒的生命力，事实上与其传播途径密切相关。

吴笛认为跨媒介传播是文字文本、音像文本、影像文本三种形式的结合，是对这古老的“三位一体”的重新认识。其中，音乐传播是以音像文本为根基，美术传播、影视传播，都是属于影像文本或视觉艺术传播的范畴。他以外国文学经典但丁的《神曲》为例，总结了跨媒介传播的三个途径：美术传播、音乐传播、影视传播。

《神曲》作为一部杰出的文学经典，其宏大的神圣主题、崇高的意境和高超的艺术水准使得这部作品在中世纪广为流传，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随后更是以跨媒介的形式广为传播，极大地影响了影视、动漫、绘画、音乐、雕塑等多个艺术领域的创作活动，在长达七个世纪的时间里为无

1 参见 吴笛：“文学经典的影视‘翻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4日，第A05版。

数的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构思的源泉，从而不仅在文学史上也在艺术史上成为跨艺术传播或跨媒介传播的一个优秀范例。¹

首先是美术传播。美术传播又分为绘画传播和雕塑传播。文学与绘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诗歌与绘画，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8世纪英国的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19世纪的但丁·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都是集绘画与诗歌于一身的大师；无论是19世纪英国的拉斐尔前派，还是20世纪欧美的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都是诗歌与绘画合而为一的文学-美术运动。就但丁的作品而言，《神曲》的绘画传播主要体现在插图作品、油画作品与壁画作品三个方面。

在插图方面，早在14世纪，当但丁的《神曲》以手抄本形式得以流传时，就有艺术家或出于自身喜爱或受命权贵为《神曲》作插图。其后，几乎每个世纪都有为《神曲》作插图的艺术家。其中著名的有：15世纪的意大利画家古列尔莫·吉拉尔迪（Guglielmo Giral di）、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米开朗琪罗，18世纪的意大利画家萨巴泰利（Luigi Sabatelli）、皮内利（Bar tolomeo Pinelli），19世纪的瑞士画家富利斯（Henry Fuseli）、德国画家科赫（Joseph Anton Koch）、法国画家多雷（Gustave Doré），20世纪的西班牙画家达利（Salvador Dalí）、英国画家巴滕（John Dickson Batten），等等。这些不同时代的艺术家都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出关于《神曲》的生动想象。在20世纪的《神曲》插图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他在1951至1960年间，共创作了101幅阐释但丁《神曲》的水彩画，之后这些作品又以木刻术进行了重新处理，构成100幅版画。他的插图线条明快、色彩和谐，既具有非现实的细节真实，又具有立体的美感和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写实手法与超现实的形象融为一体，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但丁《神曲》独特的表现手法和梦魇般的地狱场景。英国诗人兼画家布莱克同样是一位不可忘却的重要人物，他的插图更多是从《神曲》中获取精神内核，服务于自己的美术创作，其中以水彩画等形式创作的《神曲》图像，可以看成一部独立成篇的画集。在油画创作领域，但丁的《神曲》影响了英国画家亨利·霍利兑（Henry Holiday）、但丁·罗塞蒂等多位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的创作。在壁画作品方面，但丁的《神曲》对后世基督教绘画中的“末日审判”题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乔托（Giotto di Bondone）在1303-1305年间在帕多瓦的斯克罗韦尼礼拜堂绘制的《末日审判》（*Last Judgment*）右下部，描绘了地狱里的恐怖景象，与但丁《神曲·地狱篇》的描述十分吻合。安德烈亚·奥卡格纳（Andrea del Orcagna）在佛罗伦萨新圣母教堂斯特罗齐祈祷室的大幅壁画《末日审判》，在整体构思方面都受到了《神

1 参见吴笛：“但丁《神曲》的跨媒体传播及其变异”，《外国文学研究》5（2015）：88-94。

曲》的影响。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米开朗琪罗、多梅尼科·迪·米凯利诺(Domenico di Michelino)、拉斐尔(Raffaello Santi)等艺术家的壁画作品。到了19世纪,更有德国科赫(Koch)创作的马西莫别墅壁画《地狱》(Hell),以及德国魏特(Veit)创作的马西莫别墅天顶画《天堂》(Heaven),这些作品使得《神曲》题材的壁画达到了新的高度,堪称西方艺术家的“神曲世纪”。

此外,在美术领域中大家关注比较少的雕塑,也与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吴笛认为,在雕塑领域,但丁的《神曲》深深影响了罗丹(Auguste Rodin)的创作。他的雕塑群《地狱之门》(The Gates of Hell)、《保罗与弗兰采斯卡》(Paolo and Francesca)以及青铜雕塑《思想者》(The Thinker),就是受到《神曲》启发而创作的,这些雕塑作品在雕塑领域和艺术领域均享有盛誉,也是但丁《神曲》的跨媒介传播作品。

其次是音乐传播。在人类艺术的起始阶段,文学就与音乐紧密相连,原始劳动歌谣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的合而为一,是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古老渊源,使得文学经典,尤其是经典诗歌以及篇幅宏大的其他文学作品,常常被谱曲,从而以音乐的形式广为流传。尤其是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Franz Liszt),在《但丁交响曲》(Dante Symphony)中以狂野粗糙的铜管和祥和宁静弦乐的对比,构成了这部作品情绪上的基调,并通过音响色块的梦幻般变幻,勾勒出《神曲》所要表达的可怖的地狱场景。

再次是影视传播。吴笛认为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是文学经典得以流传的重要途径。文学经典以电影改编的形式获得关注,成为影像改编的重要资源,经典从此又以新的形式出现,并具有了新的生命形态。而影视作品的受众面更广,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创造了极好的契机,使得文学经典中的精神文化内涵能够更为有效地传播,更为深入人心。¹在影视传播方面,根据《神曲》所改编的影视作品流传广泛,不仅很好地传播了《神曲》这一经典文学文本,也为影视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总之,从但丁《神曲》的跨媒介传播这个优秀范例中,吴笛认为:经典文学文本不仅为美术、音乐、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无限的想象,其自身也在这些“新”媒体的跨界传播中得以再生、升华和不朽。

(三) 跨媒介传播的原则

关于跨媒介传播的原则,吴笛认为同样可以从翻译学的一般概念中获得启示。从翻译学的角度审视文字文本向影像文本等的转换,要关注的其实也是类似于翻译学话语体系中的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问题。因此,两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及其契合度,是跨媒介传播研究应当考量的重要方面。²

作为一名译者,吴笛认为能否忠实于原著精神,是衡量译本得失的一个

1 参见吴笛:“文学经典的影视‘翻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4日,第A05版。

2 参见吴笛:“文学经典的影视‘翻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4日,第A05版。

重要条件。他在翻译实践中不止一次提出，翻译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忠实于源语文本。在诗歌翻译中，他说自己追求的就是：“最小限度地丧失或最大限度地保存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力图以诗歌本文所提供的信息为依据，用准确、流畅、凝练、较为贴近读者的语言。最大可能地传达原诗的形式和内容”（《雪莱抒情小诗·序》8）。在翻译小说时，他也指出：由于各种不同的语言都有其丰富的词汇、严密的语法结构和极强的表现力，而且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语境，自己的风土人情、思维方式和生存习惯，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要忠实于原作，不能随意发挥，做到译文准确、严谨，合乎规范，译文所传达的信息内容与原文保持高度一致。¹对于跨媒介传播这一媒介意义的“翻译”来说，吴笛认为作为一个“译者”，同样也应该尊重源语文本，尽可能减少一些“译者”的风格。对于跨媒介传播研究来说，是否忠实于原著的思想内涵，同样是衡量“译本”得失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以法国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对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所改编的电影为例指出：为了渲染男女主人公的“浪漫情感”，影片以成双结对的天鹅在湖面漫游进行映衬，电影画面固然很美，但这样的处理不仅严重背离了原著的精神，而且也损害了观众的审美体验。²

在译本应忠实于源语文本的前提下，吴笛指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忠实于原作，不能随意发挥；也要把握作品的神韵，不能拘泥于字面意思，应做到形神兼顾。文学翻译作为一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不是语法加字典、剪刀加浆糊般的简单的技术性工作，也不是逐字逐句的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译者根据原作的内涵，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原作的精神和风采来。因此，在尊重译者的创造性劳动的同时，也应避免译文的死板生硬，在原文的限定下，还应体现译者的风格。³而要做到神与形的完美结合，就要在译入语丰富的语言矿产中，探寻、挖掘和选择恰当的语料。就拿诗歌和小说翻译来说，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在翻译时要注意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小说作品的基本特性是“讲故事”，服从于一定的思想内容，具有明晰的情节性，所以小说翻译主要讲究的是传达原作的内容和思想，尤其是小说的情节；而诗歌作品，无论是韵文体还是无韵体，情节都不是首要的，因此诗歌翻译更重要的是传达诗歌从意象中升华而出的意境和情感以及诗歌构成要素中的韵律、节奏等音乐特质。也就是说，小说翻译主要是传达“意义”，诗歌翻译则需要传达呈现意义的“声音”。⁴

在这种翻译原则的指导下，吴笛认为：在跨媒介传播中，由于作为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与作为绘画、雕塑、电影等视觉艺术，在媒介特质上有着各

1 参见吴笛：《浙籍翻译家翻译艺术》，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2 参见吴笛：“文学经典的影视‘翻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4日，第A05版。

3 参见吴笛：《浙籍翻译家翻译艺术》，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4 参见赵燕：“英美诗歌研究的多维视野——吴笛教授访谈录”，《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2023）：9-10。

自不同的特点，因此也不能以是否忠实于文学原著作为评判“译作”成功与否的绝对标准，但原著的精神是不能违背的。

总之，在吴笛看来，无论是文学文本的跨语言翻译还是文学与艺术之间的跨媒介“翻译”，由于国家、语言、文化、媒介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我们认识能力的局限，在“翻译”过程中很难达到完全的等值，也很难绝对地遵循某一标准。但是，译者在把源文本信息向读者传递的过程中，首先应对译文的忠实、包括对原作精神和结构等要素的精准传达放在重要位置；其次，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不应过分拘泥，应注意“译作”自身特殊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规律，尤其是对文学与艺术间的跨媒介“翻译”更应考虑这方面的特殊性；此外，译者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如不同受众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等，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力求取得理想的传达和传播效果。

三、跨媒介传播与文化传播

从纸草、泥板，到印刷、影视，再到电子网络，经典文本的传播途径与人类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同步而行的，传播途径的变化不仅促使了经典文本的流传和普及，也在一定的意义上折射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正是由于文本翻译和“跨媒介”翻译，以文学经典为代表的优秀文化才得以不断流传和再生，从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和灵魂。

对于吴笛而言，翻译所承担的使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翻译是源语文本获得再生的重要途径，纵观世界文学史的杰作，基本上都是在翻译中获得再生的。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等一系列文学经典来看，没有翻译就没有经典。如果说源语创作是文学文本的今生，那么今生的生命是极为短暂的，是受到限定的；正是翻译，使得文学文本获得今生之后的“来生”。文学经典在不断被翻译的过程中获得“新生”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文学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文字符号之间的转换，而且是一种以另一种生命形态存在的文艺创作，是本雅明所认为的那种原文作品的“再生”。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的变化，文学经典的翻译必然要适应时代的变革和需求，因此，跨媒介传播对经典文本的“重译”不仅体现了传播的需求，也通过这些新媒体使得经典得以传承，获得普及，从而获得新的生命。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电子和信息技术的推广运用，对人类文化的存在形态造成了巨大冲击，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乃至人的思维和知觉方式正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变革。在电子时代，文字日益失去其优越性和优先地位，电视屏幕和电脑网络逐渐取代书本，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体，它改变了人的知觉、思维、行为和认知方式；它的全面普及和运用，将导致以

1 参见 吴笛：“总序”，《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2卷，吴笛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8页。

文字为基本媒介的文化形态让位于以图像为基本形态的视觉文化。¹就拿文学经典的影视传播来说,在世界各国,文学经典是影视改编的重要来源,为许许多多的改编者提供了创作素材和灵感源泉。自1900年文学经典《灰姑娘》被搬上银幕之后,影视创作就开始积极地从文学中汲取灵感。据美国学者林达·赛格统计,高达85%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都是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²从根据古希腊《荷马史诗》改编的影片《特洛伊》(*Troy*),以及根据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戏剧经典《哈姆雷特》改编的《王子复仇记》(*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直到根据20世纪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而改编的同名电影《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从外国根据中国文学经典改编的《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花木兰》(*Mulan*),直到中国根据外国文学经典改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可谓无所不在,文学经典为影视改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些新媒体也使得文学经典得以传承,获得普及,从而获得新的生命。³从这些成功的改编案例可以看出,诸如电影改编等跨媒介传播手段对文学经典原著起到的宣传及传播功效不容忽视,它为文学经典的艺术性再造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促使一度被冷落、被边缘化的文学再度获得大众的广泛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的跨媒介改编和传播,其实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和跨文化交流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

换一个角度来看,文学经典脱离文本,以影像替代文字,也是文学经典本身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下的涅槃。影视使得文学经典以一种更为鲜活的方式重现,以一种更为有效的传播手段得到更多的观众认可;影视作品利用其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及其现代媒介的传播优势,成功地将大量的影视观众转化成了小说读者,从而提升了作家和小说的知名度。⁴比如,英国作家哈代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他的小说所改编的许多影视作品,同样取得了极为罕见的成功。自1913年他的长篇小说《苔丝》在美国改编成无声黑白电影并成功上演起,到新世纪英国面世的由拉夫兰德(Nicholas Laughland)执导的《绿荫之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2005)为止,哈代一些重要的长篇小说和部分短篇小说已经被改编成的影视作品高达30多种,他的长篇小说《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绿荫之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还乡》(*The Return of the*

1 参见吴笛总主编:《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4页。

2 参见吴笛:“总序”,《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2卷,吴笛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页。

3 参见吴笛:“文学经典的影视‘翻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4日,第A05版。

4 参见吴笛总主编:《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25页。

Native)、《林地居民》(*The Woodlanders*)等,都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苔丝》,先后6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他的《维塞克斯故事》(*Wessex Tales*)、《萎缩的胳膊》(*The Withered Arm*)、《两种野心的悲剧》(*A Tragedy of Two Ambitions*)等中短篇小说也被改编成多种电视剧。在吴笛看来,这些跨媒介改编不仅是在普及哈代及其文学作品,尤其是在文化传承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¹

正如吴笛所说,既然认识到了“翻译”所承载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的研究视野也应相应发生转向,即由“文学翻译”研究朝“翻译文学”研究转向。翻译文学的核心意义在于不再将“外国文学”看成“外国的文学”,而是将其看成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建设的有机整体,将所翻译的文学作品看成是我国民族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²在对外国文学经典进行研究时,应从“外向型”研究转向关注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民族形象重塑。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目的不是单纯地引进外国文化,而是要服务于中国自身的文化建设。通过外国文学经典的中国传播,以及面向世界的学术环境和行之有效的中外文化交流,将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看成是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发展历程的折射,进而重塑文化中国的伟大形象。³由此看来,经由跨媒介传播再生的国外经典作品也应该得到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既要着眼于对经典文本在原生地的生成和变异研究,更要通过对国外文学经典的译介及其跨媒介传播研究,以中华文化立场及其阔大的包容力,将之汲取为建设我国文化事业的宝贵财富,使之成为我国自身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看来,跨媒介传播研究是关乎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大事。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其目的就是为了文明互鉴、相互吸收有益的成分,从而“各美其美”,促进自身的文化建设。就拿文学来说,外国文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反过来,中国文学也对现当代外国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以英美诗歌为例,英美意象派诗歌就受到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意象派诗歌的诗体改革,以及音节、音步等相关概念的革新,都与中国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所在。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世界文学传播产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了。历史和现实中的很多事例均表明,超越纸质文本的跨媒介性“介

1 参见吴笛:“《苔丝》的生成与传播”,《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5卷,吴笛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18-219页。

2 参见吴笛:“总序”,《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2卷,吴笛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页。

3 参见吴笛:“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与拓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0日,第A07版。

4 参见王娅婷、吴笛:“基于翻译实践的外国文学研究——吴笛教授访谈录”,《山东外语教学》1(2024):8。

入”，对传播世界经典文学作品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同样，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要想走向世界，也不可忽视跨媒介传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其实也正是吴笛教授的跨媒介传播研究所昭示给我们的学术道理和文化思考。

结语

作为一位勤勤恳恳且成就卓著的“资深翻译家”，吴笛始终以一颗赤诚之心对待为之奉献毕生精力的文学翻译事业。作为一位紧随时代的学者，吴笛时刻关注文学经典的传播与再生，他的翻译事业和学术研究，尤其是他在国内率先开展的文学跨媒介传播研究，更是开风气之先，必将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

吴笛的跨媒介传播研究，旨在关注经典文学文本在影视等跨媒介传播过程中所获得的流传和再生；而他作为一位资深翻译家，一开始就坚信翻译的使命就在于使源文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到传播和再生。回顾吴笛所走的学术之路，从传统翻译到跨媒介“翻译”，他面临的是文学语言和传播媒介的不断流变，不变的则是对文学经典再生理念的坚守与传承文化使命的初心。事实上，吴笛对学术初心的坚守，就像最初翻译的诗集《野天鹅》中首尾呼应的“回旋曲式”书名一样萦绕回旋：《野天鹅》不只是一首诗，而是不同作者的两首诗；全书的编排则是自一首《野天鹅》始，至另一首《野天鹅》终……正如飞白先生所言：“我们仿佛看见一群野天鹅组成的‘破碎的环’在湖上飞旋，它们翅膀的闪闪白光时而远去，时而审新回归，很久很久，它们的影子还在眼前不肯消逝”（《野天鹅》1-2）。

Works Cited

- 龙迪勇：“画意摄影的跨媒介叙事论析”，《美术》10（2024）：106-119。
- [Long Diyong. “An Analysis of Inter-media Narrative in Pictorial Photography.” *Art Magazine* 10 (2024): 106-119.]
- ：“家族相似性、符号圈与艺术跨媒介叙事”，《中国文艺评论》6（2024）：44-68+126-127。
- [—, “Family Resemblance, Semiosphere and Intermedia Narratives in Art.”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6 (2024): 44-68+126-127.]
- ：“叙事学研究的跨媒介趋势——‘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综述”，《江西社会科学》8（2008）：57-66。
- [—, “Intermedia Trends in Narrative Studies: A Review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n ‘Intermedia Narrative’.” *Jiangxi Social Science* 8 (2008): 57-66.]
- ：《跨媒介叙事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4年。
- [—, *Research on Intermedia Narrative*. Chengdu: Sichuan UP, 2024.]

帕斯捷尔纳克：《含泪的圆舞曲》，力冈、吴笛译。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Pasternak, Boris. *A Tearful Waltz*, translated by Li Gang and Wu Di. Wuhu: Anhui Normal UP, 2008.]

雪莱：《雪莱抒情诗全集》，吴笛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

[Shelley, Percy Bysshe. *The Complete Lyrical Poems of P. B. Shelley*, translated by Wu Di.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94.]

——：《雪莱抒情小诗》，吴笛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 *The Poetical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translated by Wu Di.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92.]

王娅婷、吴笛：“基于翻译实践的外国文学研究——吴笛教授访谈录”，《山东外语教学》1（2024）：1-8。

[Wang Yating and Wu Di. “Explor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u Di.”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1 (2024): 1-8.]

魏仁：“学术人生的盎然诗意——吴笛的外国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文化正义论丛》第3辑，何勤华、傅守祥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6-155页。

[Wei Ren. “The Abundant Poetry of Academic Life: Wu Di’s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Cultural Justice Forum* Vol. 3, edited by He Qinhua and Fu Shouxiang.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5. 146-155.]

吴笛：“但丁《神曲》的跨媒体传播及其变异”，《外国文学研究》5（2015）：88-94。

[Wu Di. “The Inter-media Transmission of Dante’s *The Divine Comedy* and Its Vari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5): 88-94.]

——：“文学法律批评 VS 法律与文学”，《社会科学文摘》12（2021）：118-120。

[—: “Legal Literary Criticism VS Law and Literature.” *Social Sciences Digest* 12 (2021): 118-120.]

——：《哈代新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 *New Studies in Thomas Hardy*. Hangzhou: Zhejiang UP, 2009.]

——：《浙籍翻译家翻译艺术》。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 *Studies in the Art of Translation of Zhejiang Writers*. Hangzhou: Zhejiang UP, 2009.]

——：《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8卷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in 8 vols. Beijing: Peking UP, 2019.]

——：《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 *A Study on British Metaphysical Poet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3.]

——：“论休斯诗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外国文学》3（2023）：14-23。

[—: “A Study of the Ecological Ethical Thoughts in Ted Hughes’ Poems.” *Foreign Literature* 3 (2023): 14-23.]

——：“论司各特《密得洛西恩监狱》中的法律伦理思想”，《外国文学研究》4（2024）：125-135。

[—: “A Study of the Legal Ethics in Scott’s *The Heart of Midlothia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24): 125-135.]

——: “论布尔加科夫‘魔幻三部曲’中的科技伦理与科学选择”, 《外国文学研究》5 (2019): 52-60。

[—: “A Study of the Scientific Ethics and Scientific Selection in Mikhail Bulgakov’s ‘The Fantasy Trilog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9): 52-60.]

——: “文学经典的影视‘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4日, 第A05版。

[—: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4 January 2014: A05.]

——: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0日, 第A07版。

[—: “The Turn and Expansion of Research on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10 September 2011: A07.]

——: 《野天鹅——20世纪外国抒情诗100首》。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 *Wild Swan: 100 Foreign Lyrical Poems of the 20th Century*.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 “跨媒体视野中的世界文学”, 《浙江人文大讲堂》第2辑,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钱江晚报编。杭州: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 第101-106页。

[—: “World Literature from a Intermedia Perspective.” *Zhejiang Humanities Lecture Hall* Vol. 2, edited by Zhejiang Feder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ircles and *Qianjiang Evening News*. Hangzhou: Zhejiang Science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2007. 101-106.]

吴笛、陈逢丹: “论司各特小说中的冤狱书写与法律理想”, 《浙江学刊》5 (2024): 101-108+239。

[Wu Di and Chen Fengdan. “A Study of the Unfair Trials and the Legal Ideal in Scott’s Novels.”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5 (2024): 101-108+239.]

赵燕: “英美诗歌研究的多维视野——吴笛教授访谈录”,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 (2023): 1-11+406。

[Zhao Yan.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r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u Di.”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2 (2023): 1-11+406.]